

# 目 录

## 21世纪东亚格局下的中国和日本

摇——一个历史的视角 ..... 何芳川 辑

如何构想日中合作的问题 ..... 白石隆 辑

日中关系与东亚的未来 ..... 柳井俊二 辑

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新局面与中日关系 ..... 高原明生 辑

##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新视角：稳定构架的建立

摇 ..... 添谷芳秀摇王建伟摇戴维·韦尔奇 辑

对日关系的重心应当放在战略问题上 ..... 时殷弘 辑

## 21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

摇——从四种视角进行考察 ..... 金熙德 辑

中国的能源安保与中日关系新忧思 ..... 祁景滢 辑

## “等身大”的日本像

摇——大众文化和“实像与虚像”的二元论

摇 ..... 中野嘉子 辑

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与日本的经济外交 摇——与中国的竞争和协调产生的共同利益 摇 .....	高桥克秀	转原
中国崛起与东亚经贸结构的变化 .....	闫庆悦	转原
从人民币升值论到升值慎重论 摇——日本对华经济政策意识的变化 .....	王世文	转原
金融体制经济机能的国际比较 .....	王京滨	转原
附录一摇本书作者简历 .....		转原
附录二摇东瀛求索 2005~2006年卷论文内容摘要 (日文) .....		转原

##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于 1955 年，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团体。它是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为中心，包括在日的各界中国人及日本学者、研究人员组成的学术研究团体，含关西分会（1955 年成立）在内，现共有会员约 4000 多人，是中国人在日本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历史最长的学术团体之一，它代表了留日学界学术研究水平。

研究会在日本财团法人国际文化会馆的协助下，在和协、富士 株式会社小林节太郎纪念基金会、三和国际基金会（现 哉云国际财团）、东华教育文化交流奖学财团、上广伦理财团等的资助下，同时，在许多日本知名学者们的大力协助下，十几年来不断发展壮大，不但自身学术研究水平显著提高，而且与日本学术界的各种交流日益广泛深入。很多过去是留学生的前辈会员，现在已是活跃在日本和中国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授、副教授和研究员。

研究会更致力于与祖国的学术交流。每年都有很多的中国学者前来访问，进行演讲，共同讨论，或在本会会刊《东瀛求索》上发表论文。从 1955 年起，研究会每年出版一卷《东瀛求索》，会刊以为中日两国学术交流作贡献为宗旨，多年来刊载了大量的优秀论文。从 1955 年起，为更多地向国内学界介绍日本的研究动向和在日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促进国内对日本和中日关系的研究。研究会以论文集形式用中文由中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研究会强调学术性，为确保论文集的质量，还专门组成了由中日学者构成的高水平的编辑委员会，并实行匿名审稿制。

为扩大学术交流，研究会每年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举行一次年度学术研讨大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中日两国学者欢聚一堂，畅所欲言。一年一度的学术研讨大会不仅在留日学界影响甚大，在当前中日两国日益频繁的学术交流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此外，每月举行讲演会和定例研究会。定例研究会是为会员发表研究成果安排的；讲演会则是邀请学者来与会员进行高水平的学术讨论。

研究会的研究活动和日常运作，是在日本国际文化会馆的大力协助下，由干事会主持的。研究会同时还设立了由中日两国学者及人士组成的学术顾问委员会，讨论研究会的发展方向和活动方针，为干事会提供帮助。此外，今后，研究会将进一步努力为中日两国学术交流作出应有的贡献。

圆源年度干事会成员：

代摇表摇杨志辉（早稻田大学摇客员讲师）

干摇事摇吴茂松（庆应义塾大学摇博士生）

    祁景滢（东京大学摇博士生）

    张剑波（早稻田大学摇博士生）

    猪股名保子（庆应义塾大学摇博士生）

    徐显芬（早稻田大学摇博士生）

    窦心浩（东京大学摇博士生）

    任摇哲（早稻田大学摇博士生）

# 21世纪东亚格局下的 中国和日本

——一个历史的视角

摇何芳川\*

世纪之初，展望未来，中日两国人民都希望能拥有一个和平、安定和繁荣的世界，特别是拥有一个和平、安定和繁荣的东亚。

为此，一个稳定的东亚格局，对我们两国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们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东亚格局呢？温故而知新，不妨从历史上做一番考察。

—

我们这里所指的东亚地区，是太平洋亚洲，即从东北亚的

---

\*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日本、朝鲜半岛经中国到东南亚地区诸国。

在历史上，东亚地区曾经有过两个大的国际格局。

第一个，是古代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

“华夷秩序”自两汉直至清朝，前后约两千余年。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以降，是它的形成或雏形时期。这个格局到了唐代跃上了一个新的平台。大唐帝国，气宇恢弘，一时前来朝贡者，达苑园多个国家。到了明清两代，特别是明初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海活动时，“华夷秩序”臻于完备，达到巅峰阶段。明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华夷秩序”渐次遭到破坏。灵愿年鸦片战争以后，这个古代东亚格局终于走向完全的崩溃。

“华夷秩序”是一个古代类型的国际格局。这个格局的核心是中国。因此，以农立国、以农为本的中华帝国的统治集团和帝王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理想、理念与原则，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一国际格局的支配力量。

集中而言，中华帝国在经略这个格局中的理想、理念与原则，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即“一”与“和”。

“一”，就是中华帝国和它的代表：皇帝；就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万邦来朝”，“一统华夷”；

“和”，就是和平，即来中国朝贡各国的所谓“共享太平之福”。当然，这个和平，太平，是一种古代农业社会的理想，如“风调雨顺”，“桑麻相接”，“旌旗不动酒旗招”，等等。

在这一格局下，周边诸国只要承认中国的大一统，中华帝国就会同它们“共享太平之福”。原则上不干涉它们的内部事

务；与它们互不侵犯；对它们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等等。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古代国际格局带给东亚地区的是和平与安定。古代中国与东亚诸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从这一体制中获益良多。这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事实。

然而，当我们充分肯定中华帝国的“和”时，却要明确地否定它的“一”。“华夷秩序”总体上讲是和平的、友善的，但却是不平等的。古代中华帝国在这个“一统华夷”上面，犯过历史错误，应予以历史地批判。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双方的交流，有两千年的历史。日本在古代东亚格局下，在同中国友好交往中汲取了大量中华文明的成果与信息。

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日本有正负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方面，日本充分展示了它的民族自尊与自信。例如，天皇致隋朝的国书中，就用了“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这样对等的文体；又如，当明太祖朱元璋用某种威压式的口吻对日本说话时，日本的怀良亲王大义凛然地宣称：“闻天朝有兴兵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有跪途而奉之乎？”

另一方面，日本在汲取“华夷秩序”的理念之后，将其日本化，颇有兴建“日夷秩序”的图谋，留下后患。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就是鲜明的例证。而且，比较起“华夷秩序”来，这个“日夷秩序”的理念，从一开始就缺乏“和”气。

东亚历史上出现的第二个国际格局，是由西方殖民主义、

资本主义经营的近代条约体制的国际格局。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近代条约格局，是世界性的。东亚格局，只是它的一个局部。

自从1842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近代条约体系的理念与原则就开始成为国际关系中居支配地位的理想、理念与原则。比较起古代国际关系而言，条约体制无疑以其规范性、体系性和完整性占尽优势，从而更加适应近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发展需求。但它的核心，却是建立在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根基上的。特别是对于落后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诸国而言，西方国际政治中的这个面目，就更加狰狞。

近代条约体制的国际格局，带给东亚地区的是侵略、战争、凌辱与压榨。

中国，伴随着“华夷秩序”的瓦解，在东亚的国际舞台上，从中心滑向边缘，从主角变成配角，从历史和文明的创造者沦为落伍者。在西方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构建的近代东亚条约体系的格局中，处于受制于人的屈辱地位。

日本，在近代条约体系的东亚格局构建前期，一度曾与中国同轨滑行，面临着沦为西方附庸的深渊。1854年柏利叩关和次年签订的《神奈川条约》；1858年签订的《安政条约》系列，都是其表现。在19世纪50~70年代，日本滑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速度惊人，甚至有反超中国之势。

然而，由于日本国内各种因素的作用，促成了明治维新。在巨大的危机与挑战面前，日本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明治维新使日本摆脱了东亚各国的悲惨命运，走上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在近代东亚的格局内，日本从

边缘走向中心，成为这一格局的制动者。不过，同样地由于日本内部诸负面因素，日本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和东亚各国人民遭受惨重的灾难。但日本也终遭失败，也令日本人民蒙受了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热核灾难。

## 二

面向正在展开的 21 世纪，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历史使命：建设东亚新型的国际格局。

从理想层面上讲，这个东亚新格局，既不同于古代的“华夷秩序”格局，也不同于近代的条约体系格局。它应是和平的、合作的、友善的、多元的。总结历史经验，这个东亚新格局既要扬弃古代“华夷秩序”格局中“大一统”的不平等负面内涵，更要扬弃近代条约体系格局中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本质。在这个理想主义的格局框架下，中日两国关系将是和平的、稳定的、平等的、友善的。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将同样是和平的、稳定的、平等的、友善的。

从现实的层面上讲，这个新的东亚格局的构筑，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历史过程。它要克服和警惕许多阻力，特别是要克服来自近代西方带来的条约体系的势力，摆脱它的影响。

在这里，我想着重从中国的角度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中国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之一。对于 21 世纪东亚新格局的构建，中国有着切身利害关系。自从邓小平主持的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对于东亚新格局的构建，中国更有着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然而，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条件下，东亚格局中的主要角色，却是来自一个外东亚国家，即美利坚合众国。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更有意识地要主宰全球事务，在世界格局中充当领导力量。总之，今日之世界，美国无处不在。东亚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如今，这里已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今天，谈论东亚格局，离不开美国。中国人谈东亚格局，首先离不开中美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讲，中美关系是新世纪东亚格局和平、稳定的关键。一个稳定的、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将是东亚安全的根本保证。

中美双方在东亚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如不能得到明智、妥善的处理，就会演变为冲突。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中美双方同时也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如果双方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将压倒直至缓解矛盾与冲突。

我个人认为，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已经日臻成熟，颇为完善。这就是：中国不惜付出代价，努力营造并推进双方和平、合作甚至友善的关系。在阿富汗、伊拉克、朝核问题以及反恐诸方面，中国都是这样做的。

我所讲的中国“不惜付出代价”来搞好中美关系，并不是

毫无原则的。第一，对于美国在对外事务中经常表现出来的霸权政治与单边主义，中国应该予以批评，直至适当的抵制；第二，“付出代价”有两个底线：一个是一旦美国极右势力当政，公然与中国为敌；另一个就是所谓“台独”问题。美国一旦越过上述底线，后果不堪设想，还谈得上什么东亚格局呢？！不过，那将不是中国方面的问题了，那将是美国的智慧问题。我希望并愿意相信，伟大的美利坚民族不会出这种智慧方面的大问题。最近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布什总统针对台湾当局有关“台独”的动作明确表示了反对，就应予肯定。

我认为，中国正在坚持与美国和平、合作、友善，同时保持批评的立场，并明确自己对美关系的底线。中美两国如果能在这个前提下保持良性互动，东亚格局的构建，在现实层面上将是可行的，在理想层面上也是有希望的。

当然，东亚是所有东亚国家的东亚。21世纪的东亚新格局，并不能简单地靠少数大国来决定，而是要靠全体东亚国家来共同努力。中美关系是其重要支柱，这个支柱跨了，东亚格局也就无从谈起。中国的责任，就是要做最大的努力建设好这个支柱。

### 三

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飞速发展与巨大变化，近年来西方一些人致力于制造一种舆论，即所谓“中国威胁论”，认为伴随着中国的再次强大，将会对外部世界构成威胁，东亚自然

首当其冲。这种宣传，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使许多对中国怀抱友善态度的朋友也心存疑惑。

“中国威胁论”，依我的判断，即使不问其居心，至少也是极端不负责任的。

第一，从历史上看，中国没有前苏联那种传自沙俄的对外扩张侵略的基因；相反的，中国有着对外和平、宽厚与友善的传统。特别自近代以来，中国同大多数东亚国家一样，是遭受列强侵略、欺凌与压迫的对象。因此，中国对近代西方带来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从基本上就无好感。

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国计民生的根本大计。当前，中国正在努力走向小康，在本世纪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一个宏伟大业，需要一个和平的、友善的国际环境；首先就需要一个和平、稳定、友善的东亚格局。这个需要，不是策略的，而是战略的；不是几年、十几年的，而是几十年、上百年的。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大家到中国中西部广大地区走一走，看看那里的贫困与落后，就会明白，中国至少在一百年内，有的只是埋头建设的心情，只是期盼着有一个和平、友善的外部环境。

第三，中国现在正在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和平、友善、宽厚的人文情怀。这样，当中国再次富强，哪怕成为世界最前列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及其领导集体，也将会有足够的理性与睿智，始终如一地坚持对外和平、友善、合作与平等的理念、原则和政策。世界将会看到，中国

政府和人民在处理对外事务中，将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负责任，越来越有水平。对此，我本人深具信心。

中国外交的这种成熟与责任感，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上应该说已有上佳表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与周边其他国家，无论是东南亚还是中亚地区国家，中国都坚持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与这些国家发生矛盾与分歧的时候，中国都将首先做出力所能及的让步和妥协。我们认为，这样的让步和妥协，并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中国的光荣。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而今天又在腾飞的地区大国，应该有这样的气度。

#### 四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新世纪东亚格局下的中日关系。

我也想从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谈谈个人的看法。

从理想层面上讲，我们两国要共同为一个和平、安定、合作、多元的新世纪东亚格局而努力。在过去的世纪当中，人类经历了两场牺牲惨重的世界大战和一次损失巨大的冷战。这两热一冷的战争，留给我们的教训还不够么？难道我们就那么健忘，就那么愚昧，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新世纪还要遭受那样的灾难么？不能！我们人类应该有足够的理性与智慧，避免这类灾难再次发生。为此，我们更应走出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标榜的近代条约体系国际格局的阴影，建设新型的东亚格局。中日两国，不言而喻，对此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这种新型东亚格局的构建过程，就应是中日两国共同合作、并在合作

中加深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过程。

从现实的层面上讲，问题要复杂得多。

鉴于中日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的不同，特别还有经济上可能日益凸现的摩擦，伴随着中国的巨大发展，两国在方方面面都会出现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矛盾。加之，历史上战争所带来的民族感情的创伤，以及当今钓鱼岛等领土问题，都甚为敏感，更容易使上述这些矛盾出现加剧甚至激化。因此，在中日关系上，两国人民和领导者都将面临着许多挑战。

我个人认为，应对未来的挑战，中日双方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识大局，讲大体。我们应该认识到，即使中日两国在今后可能出现成百上千的矛盾，但两国之间和平、合作、友善是大局，是任何矛盾都不能凌驾于其上的大局。如果这个大局破坏了，我们两大民族将蒙受历史上空前的民族灾难，两国的历史将出现空前的倒退。这个大局，无论如何不可动摇。谁撼动这个大局，谁就是破坏中日两大民族的根本利益，谁就将是我们的罪人！

第二，共同努力，树立中日关系双赢的新理念。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特别是在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猖獗的历史上，一些国家、民族的兴盛常常建立在其他民族的痛苦牺牲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应予根本改变，我们应该走出上述历史的怪圈，找到双赢或共赢的道路。中日双方有责任在这方面开创一条新路。我们坚信，只要认真找，就一定能找到。

第三，在一些非重要问题上，大家要注意培养平常心。例

如，中国加入 宰鞣以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潮流。同各国之间会经常出现的经济摩擦一样，中日两国之间也一定会经常出现经济上的摩擦与矛盾。为应对这些摩擦，我们双方的人民和领导应保持冷静，特别是媒体不应火上浇油、肆意炒作，而应本着平常心，就事论事，使矛盾得到认真、积极和妥善的处理。

第四，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想就历史问题，略作赘言。我本人出生在上次中日战争中的重庆，而且是重庆“五三”、“五四”等多次日军大轰炸的幸存者。我人生中的最早的记忆，就是在防空洞里躲避日军空袭。战争的创伤对我是极深的。在很多年里，看到日本的太阳旗，我内心都会有一种痉挛的反感。但是，半个多世纪毕竟过去了，我们两国的百姓毕竟还要生活，我们两国人民不应该永远生活在仇恨中。因此，作为中国的大学教授，我对待北大的日本留学生，仍然如同自己的子侄！我也教育我的中国弟子，努力与日本同学相亲相敬。我诚恳地希望日本朋友，所有的日本长者，无论是官员、教师还是普通百姓，也都能从日本民族的责任感出发，对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特别是上一次中日战争，给日本的青少年一个正确的教育。我认为，领导人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民觉悟和理念的制约。让我们共同做好国民教育这个基本课题。这样，中日和平、合作与友善，就可以打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我对 圆世纪东亚新格局的构建，抱有审慎的乐观态度，对这一格局下的中日关系，也抱有审慎乐观的态度。我想，要去掉审慎，达到乐观，还需要共同的艰苦的努力。

# 如何构想日中合作的问题

摇摇白石隆\*

在“东亚合作”中，日中关系具有何种意义？就这个问题，笔者想在确认两点之后，再对其做一个简单的论述。

第一，本文将不讨论中国的国内因素问题。中国所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调整成本非常高。如何长期负担这个调整成本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问题。笔者深知，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国内因素对其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但在此，笔者仅指出调整成本高这一点，而不做更进一步的论述。

第二，本文将不讨论中国的世界战略问题。日本虽是大国，却不是超级大国。日本是美国的“小伙伴”，没有属于自己的世界战略。左派和右派的民族主义者都将日美合作嘲讽为“追随美国”。然而，日本没有展开独自的世界战略的能力。与日

---

\* 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本相比，终将成为“超级大国”的中国，正从这一角度出发展开自己的世界战略。但是，这个问题应该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们论述的问题，已经超越了我的能力。

本文要讨论的是一个更加限定范围的问题，即在思考东亚共同体之际“日中合作”有何意义这个问题。首先，从结论上来讲，脱离了日中合作就不可能有东亚共同体的构建。换言之，只有依靠日中合作，才能完成已经起步的东亚共同体构建这一事业。

从现状上看，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间的有关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的交涉已经开始，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仅仅形成日—中—东盟这一三角形的两边。只有实现中日的经济合作，这个三角形才能成立。其次，在安全保障方面，东亚还不存在安全保障共同体（安全保障共同体）。要构建这样的共同体，关键在于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如何将相互不信任的关系转变为相互信赖的关系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二战后，战败国日本放弃了以“发扬国威”为目的的“大国”游戏。战后日本政治的基本点可称之为“致富竞争”的游戏，也就是说，以怎样致富为目的的竞争。查尔斯·迈尔（Charles Meyer）指出，以“生产性政治”（productive politics）为特色的“经济增长的政治”，是战后日本政治的基本特色。换言之，这种政治是与阶级对立的政治有别的政治，它一方面承认现有的阶级对立，而另一方面又将其置换为国民对经济增长的赞同，通过增大“经济蛋糕”来抑制阶级对立。现在日本所面临的课题是用何种形式来再次实现“生产性政治”。

而中国是通过革命成立的国家，民族主义是其基础之一。